

香港真正的深層危機 (上)



步入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尚不足百日，世局的邊變已經出乎所有觀察家的想像。外部世界正處於東西方權力交替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處東西方力量交匯點的香港不僅無法置身事外，而且勢必首當其

衝。至於香港內部制度運行與時代的長年脫節，剪不斷、理還亂，社會矛盾日益深化，公共治理疏漏百出，與外部世界的百年危機相融合，染成香港社會深層危機的濃重底色。

陳少波 正思香港總裁

以《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去年底成法為標誌，美國率先打破了中國與英美之間圍繞香港的戰略默契。如果按照反對陣營規劃並付諸實施的區議會一立法會一選委會的奪權路徑，一步步掌握過半優勢，最終實質逼逼管治權，那麼《基本法》所塑造的制度模糊也將隨之蕩然無存。香港昔日之繁榮與穩定，其中一個充分條件是能在國家與西方陣營之間左右逢源，一旦默契不再、模糊難存，那麼香港將會撞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國際棋局。

香港撞入完全陌生的國際棋局

如果說真有新冷戰的話，那麼置身其中的香港也不可能回到1950年至1972年那個冷戰年代的香港。當其時，美國在英國的默許和配合下，可以把香港作為橋頭堡，一手實施貿易禁運，一手展開反共心理戰、情報戰。

70年後的中國，早不再是當年百廢待興的中

國，70年後的中國也不再是挾反法西斯戰爭之勝、軟硬實力稱雄世界的美國。生編硬造「東方柏林」這個標籤，不過是想喚起西方反華鷹派的冷戰記憶，滿足西方自由派媒體讀者的惡趣味，既對歷史的無知，也是對現實的漠視。

的確，中國經濟在個別高新技術領域和能源資源供應層面，還可能面對美國乃至西方陣營卡脖子的壓力，但是中國不僅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形成舉世無雙的完整工業體系，更是全球生產鏈中不容有失的鏈條——新冠疫情爆發，中國停工，全球多個行業也隨即斷貨。反對陣營的喉舌們至今還發着「天下制裁」的夢，根本不知全球化時代的本質特徵是高度互相依存。

自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確認中國為競爭對手開始，美國對華鷹派始終在推進中美脫鉤的議程，從貿易戰到科技戰，從

阻斷人文交流到打壓駐美央媒，全方位開打。香港牌其實只是早打遲打之別，而以香港作為中美緩衝地帶的可能，只是部分開明人士的美麗想像。在中美打打談談、談談打打的整體博弈之中，香港局勢只能隨之而起，隨之而落，既不可能為美方所掌控，出現什麼「中美共治」，更不可能繼續悶聲發大財，而將是一個較量與合作共存的局面，較量愈是勢均力敵，合作愈是別開生面。

西方社會治理出現尖銳矛盾

世局邊變，不僅僅體現在地緣政治層面的博弈，更震撼的是西方社會治理自身所無法逃避的尖銳矛盾。四年前特朗普上台引發的驚愕和震撼，令人們淡忘了當其時桑德斯在民主黨初選中差點阻斷希拉里通往白宮之路。四年之後，伯尼·桑德斯捲土重來，再次以激進的「革命」主張吸引了失落的激進選民，在民主黨初選起跑階段一度壓倒溫和派所支

持的拜登。在香港，桑德斯的媒體關注度並不算高，大部分讀者或許根本沒有興趣去了解其政治主張，頂多知道他被標籤為「民生社會主義」，而未必明了在桑德斯崛起背後的西方社會危機和思潮巨變，而這種危機與思潮實與香港息息相關。

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們，其實不過是其中一支要清算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新自由主義在過去四十年間扮演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四處推銷臭名昭著的「華盛頓共識」，不懈地推動放寬金融資本的跨境管治，拚命把資本趕出籠子。金融資本猛虎出籠，在全球範圍內徹底改變了資本、勞工和政府的權力均衡，結果導致所得分配不斷惡化，貧富兩極分化加劇。西方發達國家不僅面對着技術工人失業、中產階級萎縮的經濟困境，而且隨着經濟主權被架空，財政結構不斷惡化，進而對民主體制構成嚴重威脅。

(未完，明日續。)

從經濟學說看中美防疫戰 (上)

徐家健 香港亞太研究所經濟研究中心成員 美國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及資訊經濟計劃附屬學者

新冠疫情可謂防不勝防、抗未能抗。經濟學的成本效益計算，就是在防控疫情和降低經濟衝擊兩個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標取得平衡，把疫情控制到對整體社會損害最低的水平。在防疫方面，中國和美國這兩大經濟體，怎麼比？

比較中美兩地防疫戰，從經濟學角度去比就是比較兩地防疫措施的成效。比較中美兩地防疫措施的成效，我們要先知道防疫的成本與效益之所在。

新冠疫情衝擊醫療系統

從成本效益角度分析，因防疫措施有效降低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若干個百分點，便會減低因染病而導致生活質素和生產力下降甚至死亡帶來的損失。過去數十年健康經濟學估計，美國人的「統計生命價值」(Value of Statistical Life)平均約為700萬美元，而每人按年的「統計生命價值」一般在成年後隨年齡增加而逐步遞減。不同程度的生活質素下降、工作能力喪失、額外醫療成本等，同樣有數得計。

以美國流感為例，我的一位芝大老師曾估算，降低一般肺炎和流感的死亡率一成，可為美國帶來4,080億美元的社會效益。控制新冠肺炎的社會效益比控制一般流感的可能更高，主要原因是死於一般流感的多為長者。

去年數據顯示，有病徵和去看醫生的流感病人當中比例最低的就是65歲以上的長者，但留院和死亡的比例最高的又是這批長者(超過7成死亡人數是65歲以上的長者)。Mortality displacement(亦稱harvesting effect)，指的便是熱浪或疫症等奪去的生命，死者本身都是命不久矣的。

相比之下，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需要住院的比例較高，醫治的時間也較長，而痊癒後的後遺症亦似乎更嚴重，因此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的社會效益是可想而知的。

住院比例較高，亦導致控制新冠疫情有特殊的社會效益。任何地方，包括醫療系統最先進完備的地方，當病人比例超過一個臨界點，醫療系統都是負荷不來的。無奈，以上地方的疫情擴散，超過了當地醫療系統的臨界點，愈多醫護人員受感染，疫情便愈失控。控制疫情的擴散速度，讓病人有秩序地接受適當治療，可以為社會帶來很高的效益。

論防疫效益，效益與收入和人口成正比。論GDP，中美是兩大經濟體，因此兩國防疫的效益之高，可謂不相伯仲。

另一方面，不同的防疫措施亦各具成本。封路封城等極端措施，為經濟帶來的衝擊都是有數得計。這有數得計，卻不是簡單以產出佔GDP比例去估算。據第一財經研究院的估算，疫情加上封路封城等極端措施，將導致全年經濟增長下跌最多約兩個百分點。

中國防疫措施符合成本效益

「由於錯過了控制疫情的黃金時間窗口，又恰逢春節全國人口大流動，導致疫情傳播範圍極廣，規模極大，新冠病毒疫情由此成為自2003年的SARS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其導致的經濟損失和金融市場壓力也將成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面臨的最嚴重的經濟金融衝擊。」開宗明義，第一財經研究院的報告

解釋兩大因素導致新冠疫情成為中國面臨的一個嚴重的經濟金融衝擊。

疫情大規模爆發，封路封城是迫不得已的防疫戰。防疫成本高昂，皆因防疫的效益更高。

如何在防疫疫情和降低經濟衝擊兩個相互矛盾的政策取得平衡，可以參考惠州市早前發出的一份通告，通告列出企業復工審批時間安排如下：(一)工業企業：

(1)規上工業企業(產業鏈配套企業)：分批以5個階段審批(2月10日-2月24日)；(2)規下工業企業，分批以3個階段審批(2月25日-3月4日)；(二)服務業企業：分批以3個階段審批(2月10日-3月4日)；(三)建築業企業：分批以2個階段審批(2月24日-3月24日)。

要留意兩點，其一，復工審批的時序安排，是產業鏈配套、重點外貿、銷售額大、物流服務、送餐外賣、政府投資項目及重點民生工程等優先處理。由此可見，內地政府明白產業鏈配套物流服務等行業牽一髮而動全身，停產會帶來較大的經濟衝擊。

其二，是復工會否再次令疫情惡化。據我所知，回鄉過春節的工人要到城市復工，須先得到當地政府批准，而自大規模封路封城後，每村每天都會派人逐家逐戶為村民檢查體溫；離開時要先取得證明14日內健康狀況良好才會放行；電訊公司會提供資料給政府證明民眾過往行蹤，工人到達復工的地方，會再進行核實，這些措施就是管控制疫情再次爆發的風險。

從封路封城到有秩序復工，中國的防疫措施總算符合成本效益。

(未完，明日續。)

政府應公佈清晰外遊指引

鍾秀賢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出國旅遊可算是香港市民每年必備的活動，提早一年安排好來年外遊計劃的人絕非少數。復活節旅遊旺季將至，但新冠肺炎疫情不斷，政府因而發佈「建議市民應考慮延遲所有非必要的外遊計劃」。筆者認為有關的指示並不明確，甚至含糊不清，讓不少旅行社及旅遊業團體產生誤解。在客戶查詢旅行團延期時，職員便不斷用各種藉口推搪，表示未能為市民作出行程延期安排。在此，筆者建議除了衛生署作出建議呼籲外，商經局應向旅行社發出相應配套指引，從而有效保障旅遊消費者權益以及公眾衛生安全。

筆者過去周末途經某大集團旗下的旅行社，打算為家人向旅行社查詢相關外遊延期訊息。當走進旅行社後，發現一群生氣、害怕和無助的長者和婦女聚集，議論紛紛。筆者向眾人了解情況後得知，他們對不能延期和取消月底多個東歐旅行團而感到不滿。旅行社職員表示，相關東歐團如期出發，是因為早前政府所提出的外遊延期指引並不清晰，更沒有發出任何正式指引給業界。可是客戶在一月底前購買的旅遊保險，卻不會就在目的地國家因疫情被當地政府強制隔離、被迫中途折返及回港被隔離14天作出任何賠償，旅客可謂完全失去保障。

事件中，筆者主動嘗試與旅行社職員進行交涉，提出與相關管理層聯繫及反映可行建議，最終事件圓滿解決，事後有關東歐團的團友紛紛致電道謝。涉事旅行社和管理層最終以妥當的方式處理，可算是良心企業！

特區政府應盡快向各大旅行社及市民提供清晰及持續更新的外遊延期或取消指引。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想在短時間內挽回香港局勢，就必先以身作則，未來更大膽和貼地走進地區，了解真正的民情，與大眾市民同步一致，感受市民生活中的迫切需要和作出確實的支援。

美攻擊中國掩飾抗疫不力

潘偉傑

繼日前美國霍士主播沃達斯(J. Waters)在新聞節目上，認為新冠肺炎的起源來自中國，並不斷由國內蔓延至全球，中國必須負上絕對責任，並要求向世界道歉。兩周後，又有華府打手借疫情來故意抹黑中國，將「散播病毒」的罪名推卸給中國。這類小動作並不是美國媒體自發性去做的，背後應有華府官員指點，華府有此舉動的目的，就是將自身防疫及抗疫能力不足，而導致國內造成恐慌的責任，轉移至國外，從而減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今年大選時的負面形象，爭取連任的機會！

作為美國政府外交的指導刊物《外交政策》，近日刊登駐聯合國資深外交記者林治題為「中國在新冠肺炎中的外交攻勢」文章，內容矛頭直指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最近致函到聯合國的一封信。張大使寫給聯合國信函的主要意思，是中國在疫情中付出最大努力，希望能夠將這份經驗分享出來，貢獻給全世界，協助有需要的國家共同抗疫。林治在短短千多字的文章中，不斷針對中國是這次疫情中的罪魁禍首，將病毒「輸送」出外到全世界，之後就更指中國欲藉疫情來稱霸世界！目前美國防疫能力明顯出現嚴重不足。

日本媒體日前報道，美國自去年九月開始，有超過二千六萬萬人患上流感，有一萬四千多人因流感而死亡。美國疾控中心起初都以為是季節性流感，掉以輕心，沒有做好阻止病毒傳播工作。病毒跟隨其國民穿州過省，甚至橫渡太平洋、大西洋，散播至全球每一角落。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堂堂一個霸權國家，何解將新冠肺炎病毒誤判以為是普通流行性感冒，以採取流感的級別來應對「新冠肺炎」？

美國在這場重大的「新冠病毒」疫戰中，以霸權自居，結果貽誤抗疫良機，導致病毒擴散危害世界。

楊莉珊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身兼民主黨中委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蔡耀昌，早前說有食肆拒絕招待內地人涉歧視，冀社會抗疫時不要「過咗火位」，要求平機會主動調查。蔡耀昌向平機會投訴後，民主黨日前急發聲明「割席」，多名黨友聯署發信強調「蔡耀昌不代表我」，更要求他辭去黨中委之職。63名參與聯署批蔡的黨員之中，包括立法會議員林卓廷、黨副主席羅健熙、區議會主席黃偉賢及鄭麗琼等。最終在內外夾攻下，蔡耀昌辭去民主黨所有公職，僅保留黨席。



即使蔡耀昌多年以來在支聯會及民主黨出力甚多，仍然一下子被扣上「賣港」、「投共」帽子。平情而論，蔡耀昌批評有食肆拒絕招待內地人是歧視，實在很有道理。民主黨在黨綱中，不是強調自己擁護人權自由嗎？為何他們要跟蔡耀昌割席呢？這暴露民主黨的黨綱，不過是欺騙選民支持的口號。當他們發現這些口號不利鞏固黃色票源時，便會棄如敝屣，不惜拿蔡耀昌向黑暴勢力獻祭。一眾民主黨元老卻沒有一人為蔡耀昌說句公道話，可見，現在這個民主黨已失去基本黨格。

民主黨與蔡耀昌「光速割席」，實則是為了效忠黑暴，是為了達一己政治目的，繼續分化、撕裂香港。民主黨等泛暴派政黨是用最卑劣的方法食「人血饅頭」。民主黨於去屆區議會選舉贏得91個議席，比起前屆增長了48個議席，成為區議會選舉中最大黨，大批泛暴派新人湧入民主黨，頗有「改朝換代」勢頭。蔡耀昌事件更反映民主黨黨內「勇武」派崛起，已無力阻擋「乳鴿」群起的攻勢，而民主黨於半年後的立法會選舉亦無法迴避這種路線取向。

「黃店」擺開車馬是針對內地人，不招待說普通話的人。林卓廷等聯署者的逼退「理由」，指蔡耀昌作為中委，「其公開發言與民主黨堅持全面封關立場出現重大矛盾。」林卓廷等竟穿鑿附會，把拒絕內地人光顧等同支持封關，把批評「黃店」歧視的人打作反對封關。蔡耀昌關注的是部分商店歧視內地人士的經營手法，與「全面封關」的防疫措施有何關聯？

前特首梁振英在社交媒體上反問民主黨，現時美歐疫情嚴重，美國更進入緊急狀態，「民主黨會要求對美歐全面封關嗎？」去年區議會選舉，大批泛暴派「勇武」新人湧入民主黨，已使民主黨黑暴化，民主黨為爭取9月份立法會選舉的黃色選票，不惜拿蔡耀昌向黑暴勢力獻媚，民主黨只會迅速黑暴化。

假使民主黨認為黑暴化是發展唯一方向，他們有沒有問一問，他們要有多黑暴化才能佔據人心，爭取市民支持？要黑暴化，民主黨無可能比得上「本土恐怖主義」組織如「屠龍小隊」、「V小隊」和「九十二籤」等，甚至比不上「本民前」、「香港民族黨」、「學生動源」、「勇武前線」、「香港獨立黨」、「青年新政」和「土地正義聯盟」、「香港眾志」等「港獨」組織。民主黨的根基從來都不是搞激進，民主黨的元老靠做地區工作冒起，而不是靠激進、靠黑暴去吸引選票。民主黨若不回歸本源返回地區，由地區做起，是注定沒有政治前途的。

民主黨迅速黑暴化

青年 議政 穆家駿 中學教師

全球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可謂是「患難見真情，日久見人心」！最近一個星期，歐洲各地紛紛爆發肺炎疫情，當中意大利最新確診病例已經超過二萬宗，正當其國內面對如此嚴峻局面之際，歐洲其他國家諸如德國和法國卻下令禁止防疫醫療用品出口，將口罩等防疫物資配給視為零和地緣政治遊戲，更因此而發生歐盟內部的搶物資大戰，德國扣下了意大利83萬個口罩，後來更稱不見了。原本連邊境都開放的歐盟在疫情下猶如「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



反觀我們東亞中日韓三國，在疫情之下是一波又一波的防疫物資互贈，除了物資支援外，更凸顯了同為漢字文化圈的文化一致性。從日本救援我國物資上寫着的詩句，「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都是那樣地直抵人心，到韓國總統文在寅所表達的「中國的困難就是我們的困難」都顯示着中日韓三國之間的友誼，是真正的「患難見真情」！日本政府除了多次將救援物資送往中國以外，還有一個令我們更感動心坎的舉動。2月中旬，日本首相安倍主持召開的自民黨幹部會議中決定從每位自民黨國會議員3月份工資中扣除5,000日圓，折合大概約為350元港幣，用作捐贈中國防疫。正所謂「物輕情意重」，這也是日本首次因海外發生災害而以自動扣款的方式進行捐贈。最近當日韓兩國分別爆發疫情時，我們同樣馬上向日本國立傳染病研究所送贈病毒試劑及口罩；對於韓國也是馬上出口500萬個口罩。

病毒的傳播從來都不分國界、種族，當疫情持續擴散，中日韓三國即使在自己防疫物資並非十分充裕的時候，都能夠顧及鄰邦。孟子所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日韓三國即使在過去的歷史當中有着那樣那樣的戰爭與糾紛，但大家同屬儒家文化圈這個歷史基因是存在的，而這一次在西方世界因疫情而翻臉不認人的時候，東亞三國或許正是又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機，推動加快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為疫情過後經濟重新啟動帶來另一個新發展！

疫情下患難與共的東亞之交